

## 郑观应哲学思想简论

朱光甫

西方资本的侵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畸形变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室压下,逐渐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中分离出来。据统计,至甲午战争前的二十多年中,民族资本已创办了一百多个大小不同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四个城市。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它对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和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势必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从而产生出相应的理论表现。而其自身力量在沿江、沿海数个城市的集中,也有利于迅速造就一批本阶级的哲学思想家和代言人。郑观应应运而出,成了这个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杰出思想代表。

郑观应的著作,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盛世危言》是他的代表作,其中的《道器》、《〈盛世危言〉自序》等篇,则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

他坚决主张“必先立议院”(《郑观应集》上册,第313页),认为:“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极其怨”(同上,第312页)。这样的议院已带有权力机构的色彩,是洋务官僚们所未言或不敢言的,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认为,郑观应当是中国近代提出设立议会制的第一人。

他在力主“商战”的基础上,极力推崇西方的重商思想,主张“国以商为本”(同上,第593页)。他所说的“商”,包括了除农业之外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广泛领域。为了“兴商务”,他认为必须“有工翼商”(同上,第588页),发展机器制造等业。他说:“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同上,第626页)。他还认为,中国如能象日本那样“借西邻为先导”(同上,第591页),“振工商以求富”(同上,第597页),那末,在“商战”方面日本就不在话下,“驾而上之犹反手耳”(同上,第591页)。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他又是提出如下观点的第一人,即:“治乱之源,富强之本”,在于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同上,第233—234页)。这个著名的观点,此后一直影响到孙中山——毛泽东。

郑观应的上述思想主张,全都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国家独立富强、反抗外来侵略、发展资本主义的由衷愿望。他不同于地主阶级改革派魏源、冯桂芬等人把船坚炮利当作救国手段的狭隘思想,也克服了王韬等人的流于纷乱和空泛的变法议论,而是以其哲学思想为指导,把富强救国的主张,重点放在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和振兴工商的经济制度上。于是乎,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理论在维护皇权尊严的思想形式中获得了表现,做出了始

作俑者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巨大历史功绩。事实上，此后滚滚而来的戊戌风云的思想主张，也并未大量地超出《盛世危言》的范围。他的思想，为戊戌维新运动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 “道”本体的两重属性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经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科学家的翻译介绍以及教会在中国的译书，致使西方近代的几何学、微积分、天文学、地质学、古典力学以及声、光、电、化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理论和若干社会科学知识，迅速而残缺不全地传入中国。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此而极矣。”正是这类理论知识，为当时处于饥不择食、冥思枯索之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接受，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成了改造传统哲学、进行哲学变革的科学基础。在时代和阶级的要求下，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了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为中国哲学史增添了新内容。

本体论方面，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道器》中，首先提出了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实体。“道”是郑观应哲学的最高范畴。他认为“道”与“器”的关系是相对的。他指出：“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同上，第243页）。道中有器，器中有道，道与器不能割裂；如果器变，则道亦要变。关于“器”范畴，他指出：“西人所觐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同上。）在这里，“器”具有了光学、电学、化学、重学等自然科学内容。那末，既然道中有器，可知这个“道”就决不会是纯粹的非物质性实体，至少应当包含着关于物质结构的光、电、化、重等内容。因此，他把“道”的内涵规定为物质性的“物理气”。他吸取了《老子》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模式以及《易传》关于变易的思想，指出：“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名物理气，无不罗括而包举。”（同上，第241页。）又指出：“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之本，器为之末乎？”（同上。）在这里，“自”可释为自身。他把“道”的自身说成是“虚无”，即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把“道”与“器”均解释为客观实有之“物”。同时，又把作为世界万物产生根源的“道”之内涵规定为物质性的“气”，而且特别指明，这种弥纶宇宙“无不罗括而包举”的“气”，名之曰“物理气”。这种“物理气”，与上引“器”范畴的内容相联系，显然是具有自然科学的光、电、力等内容的物质性实体，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此外，他把“太极”说成是由气“凝成”（同上）的，把“力”说成有“水之阻力，机之进力”（同上，第887页）等等，也有着一线机械力学的色彩。这种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本体论的近代自然科学化，对于人类认识无疑是一种深化。从郑观应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由古代发展到近代的脉络，他已跨进了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门槛。

虽然，郑观应把“物理气”规定为“道”的内涵，可是，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他说：“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也’；有名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同上，第241页）又说：“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同上）“《大学》云：‘止〔于〕至善。’止此中也。”（同上，第241—242页）“《易·系

辞》云：“‘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存此中也。”（同上，第242页）。就这样，“中”不仅成了“天地之始”的本原，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中”的涵义，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就是“性”，也就是“善”。这样的道德伦理化的“中”，显然是精神性的实体。这也表明，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迟缓和自然科学的还不发达，因而郑观应的哲学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而难于自拔。

可见，郑观应的“道”兼有物质和精神自相矛盾的两重属性。从人类理论思维的进程来看，由于这个“道”带有近代自然科学的成份，因而比前人有所突破。但从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来看，由于这个“道”的两重属性，又说明还处于初级阶段。他试图从具体实物（器）的多样性和变化性抽象出统一的“物理气”的“道”来，其出发点无疑是唯物的。但由于他不能区分物质与精神，因而也就不能把具有某些机械唯物主义特点的自然观贯彻到底，终于使“道”的抽象又成为精神性的“中”，其归宿点又陷入了唯心主义。郑观应世界观中这种矛盾性格，恰好是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资产阶级在现实斗争中极端软弱的思想反映。

### “名副其实”、行而后知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方面，郑观应对我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理论，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名实关系上，他反对“务虚名而不求实效”，指出：“彼西人笑我士大夫不识时务，凡创一事属新法者，虽有利于国，往往阻于泥古之士似是而非之说，务虚名而不求实效。”（同上第237页）因而，他主张凡事都要“各擅所长，名副其实。”（同上，第234页）这里的“名”是指“新法”之“名”，“实”是指“新法”之“实”，从而使名实这对范畴，具有突破传统的意义。他关于名称应当符合事物实际情况的观点，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在名实观上的具体贯彻。

那末，如何做到“名副其实”呢？郑观应通过对传统的知行观作了新的阐发，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主张学以致用，行而后知。他自称：“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弊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同上，第233页）。他对“中西利病情形”的认识，是“或得自阅历中来，或闻自中外友朋，或辑自近人论说。”（同上，第237页）在他看来，认识是来源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来源于感官所能感觉到的客观实际。同时，他还转引张靖达的话说：“谋定而后动”（同上，第234页）。“谋”即思考，属于理性认识范围。总之，他认为只有在行的基础上获得的知，在指导行时才会取得实效。就治病说，人“有体质之病、有功用之病、有体质功用相兼之病”，医生“必先细心认明，方能施治”（同上，第156页）。就商务说，“商务一端必须统筹全局，果有把握而后可行”，否则“必至一蹶不振”（同上，第610—611页）。他把“知”的范围扩大到西医等西学，对“行”的涵义也赋予了近代工商业活动等新内容。

尽管郑观应对传统的知行等范畴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但应当看到，他在认识论方面还存在着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论证，从这个角度看，也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不成熟性。

### “西学化为中学”的发展观与“器可变， 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的矛盾

在发展观方面，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

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巧夺天工”（同上，第736页），“以

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同上，第481页），人也可仿行西法，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关于改造社会，他指出：“有治法必须有治人。”（同上，第596页）只有“人才辈出”（同上），“主治得人”（同上，第932页），中国才能“日臻富强”（同上，第596页）。可见，要做到对客观现实的改造，他认为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此，他本人是深有体会的。名扬中外的《盛世危言》之得以问世，正是他本着“欲使天下人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勿为外人所侮”的殷切愿望，花费了数十年的岁月，“不惮心力交瘁，不顾忌讳”（同上，第237页）的辛勤努力才告完成的。郑观应这种富于进取的精神，正是新兴资产阶级革命积极性的鲜明写照。

在常与变的问题上，他指出：“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同上，第301页）从世界历史看，“世界由戈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同上，第481页）从列国现状看，“彼（东西各国）崇新而强，我泥古而弱。”（同上，第636页）他的结论是：我国欲自强，则非“取俄、日、普变法之成案，实力仿行不可”（同上），只要“崇新”而不“泥古”，“弱”就可以转化为“强”。

在上述对历史以及现状的坚实论证的基础上，郑观应提出了“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颉颃”（同上，第301页）的命题。这个所谓“以西学化为中学”的“西学”，用他在1884年所阐述的话说，就是“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同上，第967页）。所谓“体”是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的文化科学和民主代议制度，所谓“用”是指“制器械、铁路、电线”（同上）等物质文明。他认为对于西方各国的体用，中国不应当象洋务派所主张的那样“遗其体效其用”，否则就会“事多扞格，难臻富强。”（同上）也即是说，西方既有值得学习之“用”，也有值得学习之“体”。郑观应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这个命题，无非是为了实现中西融合，同一体用，迅速达到彼此强弱不相上下的目的。从实质上看，他所力主的“议院”等政治制度定会破坏封建的传统之“道”，“铁路、电线”等物质力量也必将带来一个新的世界，中国的社会制度必定会发生质的变化。可以说，他关于“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至少具有质变的因素。在他稍前或同时的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中，他们在发展观上的共同特征是只承认渐变而否定突变。例如王韬，他说：“天时有寒暑而不能骤更，火炭有冷暖而不能立异，则变亦非一时之所能也，要之在人而已矣！尽人事以听天心，则请决之以百年”（《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薛福成也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筹洋刍议·变法》）。与之相较，郑观应这个颇具远见的命题，显然是高出一筹的。

应当说，郑观应的这些思想都是可贵的。如果他的发展观仅是到此为止的话，那末，无疑具有着辩证法的性质。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归结。他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道不可变”（《郑观应集》上册，第240页），从而在方法论上不能不陷入形而上学。他说：“我变者乃富强之术，非孔孟三纲五常之道也。”（同上，第386页）“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同上，第276页）“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同上，第240页）据此，他论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认为存在着一条“直可操券而卜之”（同上，第243页）的规律，即：由约而博、“由博而约”（同上）。这里的“博”是指“器”，而“约”是指“道”，即所谓“一语已足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同上）他把一切都包括在“道”的封闭体系之内，道就是绝对真理，于是也就无所谓发展了。

总之，郑观应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反

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在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中, 包含有联系、发展的思想特点。郑观应在发展观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归结, 是和他在本体论中关于“中”道的思想分不开的。

### 郑观应哲学的历史地位

不成熟的阶级产生了不成熟的世界观。郑观应哲学明显地具有矛盾的特征, 缺乏理论深度和彻底性。他的唯物论思想特征, 主要是采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物质观, 把世界的本原特名之曰“物理气”。但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 世界的本原又被他赋予了“中”的内涵, 最终滑向了客观唯心主义。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特征, 主要表现在渐变论方面。这种渐变论是形而上学的特殊形态, 在形而上学倾向中包含有发展的思想。郑观应的哲学思想, 是在承受了历史上朴素唯物主义优秀传统的影响下, 尽量地吸取了西学的成就, 对道器、体用、本末、知行、常变等范畴作了新的探讨, 在自然观、知行观和发展观诸方面开拓了新的领域, 给当时的思想界带入了一种新鲜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从而触动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 影响了十九世纪末期一代人的新觉醒。

就哲学史而论, 似可说, 郑观应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的开端,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本体论上, 郑观应首先提出了带有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最高范畴“道”。这个作为世界本原的“道”, 包涵有“物理气”和“中”的两重属性。中经严复, 他把“气”即“最清气名伊脱(Ether)者”(《天演论·真幻》按语), 也就是物理学上的“以太”, 作为世界的本原, 从而否定了郑观应“道”所包涵的“中”的属性。孙中山对此进行了总结, 把“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伊太’也)”(《孙中山选集》, 第156页)看作是世界的本原, 指出“地球本来是气体, 和太阳本来是一体的”(同上, 第693页), 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以太——气体”说。在知行观上, 郑观应在予知、行范畴以西学内容的基础上, 主张学以致用, 行而后知。中经谭嗣同, 他片面地提出了“贵知不贵行”(《谭嗣同全集》, 第36页)的命题, 从而否定了行而后知的观点。对此, 孙中山坚持了“学而后知”(《孙中山选集》, 第2页)的反映论, 主张行在知先, 行是检验知的标准。他的“以行而求知, 因知以进行”(同上, 第160页)的命题, 达到了资产阶级哲学在知行观上所能达到的时代最高峰。在发展观上, 郑观应在形而上学的倾向中, 包含有辩证法的思想或因素。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 认为人可以“巧夺天工”, 主张“以人事补天工, 役天工于人事”。同时, 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观点, 具有承认突变的意义。对此, 严复则断言“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群学肄言》)、“万物皆渐而无顿”(《政治讲义》), 否定了突变。康有为后期, 也同严复一样, 认为进化“实难蹴等”(《法国革命史论》), 以此反对革命。孙中山则又予以了总结, 强调“人为的力量, 可以巧夺天工, 所谓人事胜天”(《孙中山选集》, 第630页), 主张革命行动可以加速社会历史的进程, 指出所谓“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 不能蹴等而为共和”“此说亦谬”(同上, 第73页), 认为“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十年、二十年之后, 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即或胜之焉, 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同上, 第72页), 从而肯定了郑观应的“以西学化为中学”等命题的合理成份, 并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也是他比前人进步的地方。如果说,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 把从文艺复兴到近代的哲学发展列举了三个圆圈, 其中的第二个圆圈是: 霍尔巴赫——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那末, 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发展, 也该存在着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就是: 郑观应——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